

马礼逊评传

顾木声著

Ma Lixun Pingzhan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马礼逊评传

顾本声 著

Ma Lixun Pingzhan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礼逊评传 / 顾长声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0
ISBN 7 - 80678 - 607 - 4

I . 马... II . 顾... III . 马礼逊, R. (1782 ~ 1834)
—评传 IV . B979.9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302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装帧设计 杨 捷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马礼逊评传

顾长声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 × 965 印张 13.5 字数 145,000

2006 年 10 月第一版 200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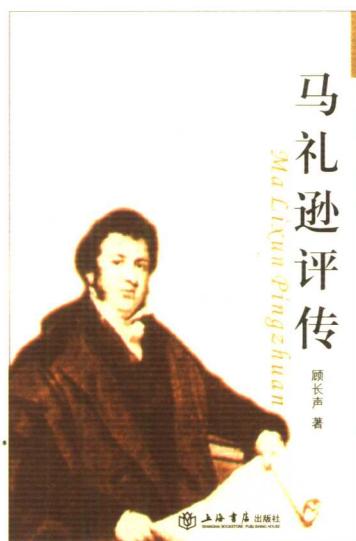
ISBN 7 - 80678 - 607 - 4/K · 105

定价:28.00 元



作者在加州大学
圣芭芭拉分校摄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容闳一向西方学习的先驱》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中国基督教简史》
《欧风美雨袭中华》
《马礼逊回忆录》中译本



责任编辑 沈佳茹
封面设计 杨 捷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目 录

引 言	1
1 从接受基督教洗礼到立志献身传教	12
马礼逊在高士坡传教院学习了 20 个月,他的勤奋 学习和宗教修养,使他在前往中国之前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伦敦传教会决定在 1806 年 12 月学期结束后,在 1807 年 1 月派遣马礼逊首次前赴中国。	
2 第一个被派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	29
在这遥远的地方,我进入了又一个新年。 目前我在情绪上感到抑郁,因我在这里相当孤独, 没有一人可称之为我的朋友。	
3 在澳门结婚并兼任东印度公司译员	44
我非常关切我和玛丽的关系。主啊,我需要聪明和 恩惠,求主帮助我。求你也赐给玛丽聪明和恩惠,因为 我盼望能和她结婚成为终身伴侣。	
4 呕心沥血翻译《圣经》与编纂《华英字典》	66

若有人能独自翻译《圣经》与编纂《华英字典》并出版,恐非马礼逊莫属。马礼逊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呕心沥血地工作,仅用了15年,便完成了这两项对世界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任务。

5 在东印度公司任译员期间的马礼逊 89

我考虑愈多,愈是使我相信,向中国走私鸦片是与基督福音里的道德观完全违背的。接受福音是我唯一应当走的道路,走私鸦片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上帝,同时又侍奉玛门。

6 马礼逊与米怜合作在南洋建立基地 110

我早已把中国作为我安身立命之地,我已下定决心要依附于她。我有一位得力的助手,是他建立了英华书院。我真的希望他今天能和我们一起开这个会。但上帝的旨意必须要成全!米怜博士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离开这个世界安息了。

7 回英述职获殊荣与续弦后重返中国 141

现在我有点担心或者说是领悟为何重度在中国的生活,可能会死在中国和埋葬在那里。但是,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但愿这次航海去英国,必定是为我个人好,为我的亲友们好,也是为中国好。

8 继续工作直至与世长辞的最后八年 168

1827年始,到1834年止,马礼逊为《广州志乘》撰稿长达7年之久,不仅稿酬照拿,而且两人还成为莫逆

之交呢！你卖你的鸦片，我传我的教，大家心里有数。在 11 月 10 日写的日记中他还申明：“除了我为《广州志乘》撰写传教稿件外，我与该刊没有别的关系。”这实在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附录一	195
附录二	198
后记	204

引　　言

基督教最早输入中国是在唐朝，称景教。

公元 635 年，叙利亚人阿罗本首先从波斯前来中国开教。据《唐会要》卷四九载称：

(唐太宗在公元 638 年下诏)钦准景教可在华传教建寺。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景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有关景教在中国传教的史料，仅有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在敦煌石窟发现的零星景教文献等，证实确为基督教，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所创，时在 428 年，属东方教会中的一支。

景教在中原一带和华南地区传教、译经和建寺，招收教徒约 200 年之久，但无从查考有多少信徒。到唐武宗即位，他下诏铲除外来宗教，景教徒四散，后续无人，直至淹没，那已是在唐朝末年的 841 年了。

如此过了 400 多年，到 13 世纪的元朝，久已绝迹的景教又重入中国，那是在 1278 年。接踵而来的是罗马天主

教，属西方教会。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意大利人孟高维诺和多明我会皮奥多两人前来中国，皮奥多在途中去世，孟高维诺在 1294 年到达北京。

元朝统治者无法辨认这两派，统称之为也里可温教。景教除在中原一带传教外，还到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传教。罗马天主教除在北京传教外，曾远至福建泉州传教。也里可温教究竟有多少教徒也无从查考。

这几个教派在元朝存在仅 90 多年，到明朝初年，也里可温教徒大多随蒙古军队西撤，也里可温教随之消失，那已是 1368 年。

如此又过了 200 年，属西方教会的罗马天主教再度试图进入中国，那已经到 16 世纪了。

葡萄牙是最早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1557 年，经明朝嘉靖帝恩准，允许葡萄牙商人在澳门交纳地租建屋与中国互通贸易。当时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在此之前即要求罗马教皇保罗三世派遣天主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

第一个被派遣来中国开教的是天主教耶稣会西班牙人沙勿略。他在 1552 年 10 月乘船到达广东沿海的上川岛，同年 12 月因病在那里去世。后来因澳门已成为葡萄牙的贸易基地，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即陆续被派到澳门开始传教，招收当地中国人入教。据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 169 页载称：

凡入天主教者皆须学习葡国语言，取葡国姓名，度葡国生活，故不啻进教即成为葡国人也。

又据《江南传教史》上编卷一载称：

澳门已成为葡萄牙在远东势力的中心。中国、日本和马来亚的传教事业，都以澳门为补给站。

罗马天主教会经过 20 余年的策划，在 1583 年，罗马教廷特使罗明坚打扮成商人，跟随葡商前往广州和肇庆，向中国地方官员“赠送厚礼”以建立关系。两年之后，罗明坚带了利玛窦重至肇庆，向当局再次“送礼”，请求允许他们在肇庆居住。据卫三畏《中国总论》卷二第 169 页载称：

他们向中国官员请求一块小小的空地，建造一处寓所和一座教堂，以便在那里念经和祈祷，隐居和默想。因为在商贾云集喧嚣杂沓的澳门是无法进行的。

他们的请求终于获得了同意，于是利玛窦一人被留在肇庆，但他并未隐居，而是开始在中国内地传播西方的基督教，即天主教，又称旧教、罗马公教。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为耶稣会修士，他在肇庆传教 6 年后前往广东韶州传教，不久又前往广东南雄，江西南昌，江苏南京和苏州等地传教。每到一地，就与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结交。如此这般直到 1600 年，利玛窦带了大批礼物，经天津直达北京，那已是 1601 年 1 月 4 日了。他向明朝万历帝献上厚礼，获得优待，赐屋在北京宣武门内居住，据《江南传教史》上编卷一第十章载称：

所需皆由朝廷供给。每阅四月，颁赐银米，约合每月六至八金盾之数，足敷神甫们需用。

由此而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得以成批进入中国各地，广传教义，吸收中国人加入天主教为教徒。

天主教传教士来自西欧各国，他们不仅传教，也介绍西方 16、17 世纪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在宫廷内帮助修纂历书等。如此到了清朝，天主教传教士仍获准在中国传教。直至 18 世纪初，罗马教皇制订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的政令和习俗的“禁约”，开始干涉中国内政之后，康熙帝在

“禁约”末条“朱批”道：

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同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比比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干涉中国内政的起因在于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时对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的不同意见的争论。罗马教皇公然派特使要求中国皇帝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祀祖先和尊敬孔子，故康熙帝有此“朱批”，那是在 1720 年。

雍正帝即位后，在华的各国天主教传教士仍为此争论不休。西洋传教士借此所谓“礼仪之争”，其实质乃反映了他们各所代表国家的殖民势力在中国的争夺，故雍正帝决定正式颁布禁教令，在此之前，雍正帝召见仍在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言明政策如下：

朕治国最注重的一条，就是绝不违背先皇治国之道。

近在福建的西洋人践踏我法律，扰乱我百姓，当地官员上奏申报，事关国家，朕当负责制止。

你们想要中国人都成为天主教徒，朕知此为你教的宗旨。果真如此，则中国人不都成了你们的百姓，一旦有事，教徒则唯你们之命是从。虽目前尚不必顾虑及此，但当千舟万船入侵我海岸时，则祸患大矣！

中国北有俄罗斯不可轻视，南有西洋各国，也不能掉以轻心。西有鞑靼，朕须阻止其入侵中国。沙皇使臣曾请求准许俄人到各省经商，朕已拒绝，只允许他们在北京和边境贸易。今朕允你们在北京和广州居住，

如有怨言，则也不准你们在北京和广州停留。朕不欲各省有你们的人。先皇曾许你们到各省，颇为士绅所不满。今朕既在位，惟以治国为要务。（《坊表信札》卷三第 363 页）

雍正帝及其后即位的乾隆帝和嘉庆帝都实行禁教政策，直到鸦片战争，长达 120 余年。清朝政府除留少数传教士在北京修历外，据英文《中国丛报》1833 年 2 月和 1844 年 11 月刊文载称：

据 1810 年的报告，西欧天主教传教士仍有 31 人秘密地在中国内地 16 省活动；到 1839 年 6 月，天主教传教士仍有 65 名在中国活动。

另一支基督教输入中国是属于东方教会的俄国东正教。11 世纪初，东西部教会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到 1054 年，东部教会大主教在君士坦丁堡宣布与在罗马的西部教会教皇利欧九世决裂。从此东方基督教称为正教，或东正教，西方基督教称为公教，即罗马公教、加特力教。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后者以罗马为中心。

俄国东正教的传教士进入中国是在 17 世纪末，即 1695 年，清朝皇帝准其在北京建造一座教堂。到 18 世纪初，即 1715 年，俄国沙皇政府正式派遣第一个传教士团进驻北京。1725 年，中俄谈判《恰克图条约》，其第五条载称：

在京之俄馆，嗣后仅止来京之俄人居住，俄使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帮助俄馆盖庙，现在住京喇嘛一人，复议补遣三人于此庙居住。俄人照伊规矩礼佛念经，不得阻止。

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早在 1715 年 5 月 1 日即有 11 名修士到达北京，到 1728 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

正式容许天主教传教士每隔 10 年可派员到北京居住，其中 4 名为东正教修士，6 名为到中国学习满、汉文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学生。每 10 年进行调换。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 120 多年里，由于在北京的俄国传教士团人数的限制，其主要任务不在传教，只吸收少量中国信徒。可是他们因长住北京，除俄国学生轮替在中国努力学习并有好几位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外，可以搜集大量的中国情报，包括清朝的政治、经济等第一手的资料，对沙皇入侵中国、掠夺我东北广大土地，都是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仅举第九届被派到中国的领班修士大司祭俾丘林为例。他在北京居住 13 年，对教务并不在意，但却孜孜不倦地读书和研究中国问题，精通满文和汉文，将“四书”全部翻译成俄文，还编译了《蒙古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蒙古律例》等书在俄国出版。回俄国后，他还向沙皇和俄国政府详细报告了清朝的实际情况等。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从 18 世纪初进驻北京，即使到了鸦片战争期间，照样留在北京，并供给情报给入侵中国的英国远征军，甚至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传教士还出任了俄舰侵华的译员和谈判代表，攫取了许多特权。

当沙俄在 1854 年派大量侵略军出征我国东北之时，东正教传教士竟在教堂外面悬着大幅标语道：

拿下阿穆尔，守住这边疆！

蒙古，勿开口！

中国，莫争辩！

对于俄国，北京也并非遥远的地方！

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在 1858 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 1860 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他们都是条约谈判的参与

者,以致中国丧失了大量在东北的领土,其中包括在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和乌苏里江以东 40 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甚至在 1864 年中俄签订《勘分西北界约》时,中国又丧失了 44 万平方公里领土,这 144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至今仍由俄国占领,可见不论是西欧或俄国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并不如有些天真的中国基督教徒所认为的都是“神圣”的,早在 17、18、19 世纪初,即已干涉中国内政,参与侵华活动。

最后前来中国传教的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

基督教新教,又称抗罗宗、耶稣教,在中国一律简称为基督教。它是 16 世纪初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德国天主教神甫马丁·路德是这个运动的先驱,反对罗马天主教教皇出售所谓赎罪券是这个运动的导火线。

那是在 1517 年,罗马天主教教皇利奥十世大张旗鼓地强迫天主教徒购买赎罪券,罪岂能赎卖? 神职人员哪能赎罪? 于是马丁·路德首先发难,亲赴维堡大教堂在墙上张贴了一张题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的大字报,从此揭开了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序幕。

大字报共列举了九十五条论纲,主要内容有:

教皇无权赎罪。

没有赎罪券,教徒仍可获得耶稣的赦罪。

忏悔是关键,而不是向神甫告罪或购买赎罪券。

即使没有神职人员帮助,相信都可获耶稣的补过。

教皇和神职人员都不应当滥用权力。

到 1520 年夏,马丁·路德正式宣布与罗马教廷公开决裂,由此而出现独立的基督教抗罗宗,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陆续出现的抗罗宗各派,统称

新教。

最早成立的路德宗,是以马丁·路德树立的因信称义的神学观点而建立的新教教派,又称信义宗。到16世纪末年,全德国已有三分之二基督徒改奉信义宗。其后又出现了长老宗、圣公宗、清教徒宗、公理宗、门诺宗、浸礼宗、公谊宗和卫斯理宗等各主流宗派。各派各自独立,同属基督教,但信条各有所侧重。

基督教新教输入中国是在19世纪初的1807年,第一位从西欧派赴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是罗伯特·马礼逊。他在中国活动20余年,成为中国基督教新教的奠基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

但早在17世纪初,新教曾有过输入中国台湾的尝试。据英文《中国丛报》1851年8月号所载题为《荷兰在台湾传教概况》一文所称:

荷兰殖民者曾在1624年入侵台湾,1626年台湾即出现荷兰新教传教士的踪迹,他们在台湾传教30余年,招收了一批中国人入教,但到1662年,郑成功把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包括所有的传教士驱逐出境,新教在台湾也随之消逝。

1792年,英国政府派使臣马戛尔尼前来中国,于次年到达北京,曾向乾隆帝提出7条要求,其中第七条要求准许英国派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到中国传教,遭到清帝拒绝。

但当时的英国,由于在18世纪中叶首先开展工业革命,产生了近代工业,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夺取了海上霸权之后,仍竭力向外扩张殖民势力。英国东印度公司已入侵印度,并已在澳门设立分公司,在广州十三行设有商行。为了追随殖民势力,英国基